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评介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1册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8册。前者是检索国图藏敦煌遗书新旧编号对应关系的索引,后者则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敦号依次著录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文献、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编纂者在充分总结以往馆藏目录著录内容的基础上,所设计的具体著录事项则远远超过以往的馆藏目录,很多事项均属首创。所以,该目录设计的著录内容不仅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以后英藏、法藏、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纂提供了著录范式。

关键词: 中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 总目录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001-06

由方广钊教授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目录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1册,101.1万字,2013年4月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8册,1431.4万字,2016年3月出版。以上两种合计1532.5万字,就字数而言,这两种皇皇巨著虽不敢说是全世界篇幅最大的馆藏目录,说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敦煌遗书馆藏目录则是毫无疑义的。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而敦煌遗书又是四大发现中最重要的发现。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藏家。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总数有16500多号。绝大多数为汉文,约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收稿日期: 2019-10-12

作者简介: 郝春文 (1955-), 男, 北京人。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从敦煌遗书入藏起至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先后编纂了《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皮藏册》和《数据目录》《敦煌石室写经残卷详细目录》《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等目录,涵盖所藏敦煌遗书 11000 多号。但其中正式发表的只有 8000 多号。占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二分之一。已经发表的目录,由于大部分都完成得比较早,其中不少文献,特别是佛教文献没有能够考订出来,或者考订有错误,需要进行重新审核修订。为了给学术界提供一部定名准确、著录详尽,包括全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以方广钊为首的编目团队自 1984 年起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经过 30 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新旧编号对照表卷》和《馆藏目录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实际上是检索国图藏敦煌遗书新旧编号对应关系的索引。所以需要编纂这样一卷新旧编号对照表,是由国图藏品的来源及编目的历史造成的。就藏品来源而言,国图藏品的主体部分是 1910 年从敦煌直接押运而来,但其后亦有不少藏品是通过其他途径陆续入藏的。不同来源的敦煌遗书具有不同的编号。就编目的历史而言,如上所述,从 1910 年至 2012 年,一百多年间国图正式编纂的目录就达八种。不同时期编纂的目录对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也不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编纂之前,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存在七种编号,即千字文号、缩微胶卷号、新字头号、采访号、简编号、登字号、善字号。这七种编号每种涉及的遗书多寡不一,不少编号互相交叉,有的遗书先后有多个编号。这些不同的编号大多曾在学术出版物上流传,但多数研究者对这些编号的来源、意义不甚了解,乃至出现误解、误用的现象。为了彻底解决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现象,以方广钊为首的编目课题组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新设一种阿拉伯数字编号统摄馆藏全部敦煌遗书。即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给每件敦煌遗书以新的编号,次序排列,并接受我的建议,用“北敦”(BD)(意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两字作为新编号的字头。

采用新的统一编号虽然解决了国图藏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问题,但同时也就出现了新旧编号对接的问题。因为过去使用的千字文编号和缩微胶卷编号等旧编号都在过去的出版物上流传甚广,如果没有检索新旧编号对照的工具书,人们就无从检索旧编号在新的编号系统中的位置。这不但不利于新的编号的流行,也会给学界增加新的困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表卷》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卷编者共编制了九个对照表,即《〈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分册简表》《千字文号与北敦号、缩微胶卷号、临字号对照表》《缩微胶卷号与千字文号、北敦号、临字号对照表》《临字号与千字文号、北敦号、缩微胶卷号对照表》《残字号与北敦号、临字号对照表》《新字号与北敦号、临字号对照表》《简编号与北敦号对照表》《善字号与北敦号对照表》《登录号与北敦号对照表》。通过这八个对照表,读者可以轻易地检索到以

往国图任何一种编号在新的北敦编号体系中的位置。在《馆藏目录卷》中，编者又以参考号的形式，罗列了每件遗书曾经有过的其他编号，以便读者了解该件在旧的编号体系中的位置。这样，读者可以通过《新旧编号对照表卷》和《馆藏目录卷》双向检索每件国图藏敦煌遗书在新旧编号体系中的对应位置，从而完美地实现了新旧编号系统的对接。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8巨册实际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主体部分。这一卷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敦号依次著录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文献、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其著录的具体内容包括编号、文种、分类号、文献的名称（卷本、卷次）、参考号（千字文编号、缩微胶卷编号等）；总体数据（包括长度、高度、纸数、总行数与每行字数）、每纸数据（包括长度和抄写行数）、外观描述（包括装帧形态、首尾存况、纸张及加工工艺、遗书卷首附件、卷面保存情况、卷面附加物、界栏、尾部情况、古代裱补、现代修整等）、多主题著录（著录多主题遗书中的各主题文献）、多主题关系（著录多主题遗书中诸主题的相互关系）；首对照（著录该主题文献首部文字残全情况及与对照本文字行款的对照）、尾对照（著录该主题文献尾部文字残全情况及与对照本文字行款的对照）、录文、说明；首题、尾题；异同（著录该主题文献与对照本的异同）；首缀残（著录该遗书首部与哪一件遗书可以缀接）、尾缀残（著录该遗书尾部与哪一件遗书可以缀接）、特殊缀接（著录遗书与哪一件或哪几件遗书虽非典型的首尾缀接，但可以其他形态对接）、集合（著录该遗书与哪一件或哪几件遗书虽不能直接缀接，但原属同一遗书）；题记（著录该主题遗书的题记、题名、勘记）、印押（著录该主题文献中的印章、画押）、杂写（著录附着于该主题文献所在遗书，由同一抄写者或由其他人随意抄写的文字）、护首与扉页（著录该遗书所附护首及扉页的情况）；年代（著录该主题文献的抄写年代）；文字（著录该主题文献的字体，以及避讳字、古字、合体字、异体字的使用情况）、书写符号与修订（著录该遗书卷面各种书写符号、涂改、修订等情况）；收藏鉴赏（著录该遗书在现代流传过程中由现代人所附加的内容，包括装裱、题签、题记、印章、扉画、勘记等）；图版（著录该遗书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及《敦煌宝藏》中的出处）；揭裱互见（著录从该遗书上揭下且另行编号的古代遗书。或著录该遗书系从哪一种遗书上揭下）；备注（著录该遗书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以上所列条记目录共有13条，每条下著录的内容一项至数项不等，总共需要具体著录的项目达40多项。当然，由于每件遗书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著录的具体项目也有差异，其著录原则是每件遗书对应诸项著录相关信息，有则著录，无则空缺。

由于敦煌遗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相关目录对它的著录越详细，读者就越能全面了解其承载的多方面信息。以往的目录多偏重文献价值的著录，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多。如最早公开出版的国图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内容包括经题和每卷起、迄，纸数、行数、题记和残缺情况等，均属对遗书文献价值的记录。以后国图编纂的

《敦煌劫余录续编》等目录，其著录内容比《敦煌劫余录》有所增加，但仍然基本限于对遗书文献价值的记录。其他重要馆藏目录如1957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的内容有十多项，其内容虽仍以记录遗书的文献价值为主，但已包括对纸张的情况和字体的描述。纸张情况属于对遗书文物价值的记录，字体则属于对文字价值的记录。此后于1963年和1967年先后出版的两册《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著录的内容增加到20项左右，也包括对纸张情况和字体的描述。1970年后陆续出版的《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著录的项目一般不超过十项，但仍然包括对纸张情况和字体的描述。

由此可见，在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编目史上，翟理斯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在内容著录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编纂者没有明确按敦煌遗书的文物、文献和文字三个方面进行著录，但他设计的著录内容实际已经包括了这样三个方面。这一设计对以后的俄藏敦煌遗书和法藏敦煌遗书的目录编纂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者正是在充分总结以往馆藏目录著录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用“条记目录的方式著录每件敦煌遗书上保留的文物、文献、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而其设计的具体著录事项则远远超过以往的馆藏目录，很多事项均属首创。所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设计的著录内容不仅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以后英藏、法藏、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纂提供了著录范式。

如上所述，此前编纂的《敦煌劫余录》等国图馆藏目录，都只是国图收藏的部分敦煌遗书的目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则最终收录了国图收藏的全部敦煌遗书。这部最全的国图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在文献的定名方面也解决了一大批文书的命名问题。

由于很多敦煌遗书是残篇断简，确定这些文书的性质和名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馆藏目录卷》在定名方面取得的进展首先是给一些原来未命名的文书确定了名称。如BD00001背，《敦煌宝藏》定名“西域文五十七行”，《馆藏目录卷》具体确定其为“藏文秽迹金刚类经典或仪轨”。其次，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定名。如BD00041，《宝藏》定名为《大悲明二赞》，《馆藏目录卷》考定其为《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咒钞》两件文献。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不够确切的定名。如BD00002、BD00047，《宝藏》定名《佛名经》，《馆藏目录卷》定名为《佛名经（十六卷本）》，这比《宝藏》更加准确和具体。大部分以往未能确定名称的文献在《馆藏目录卷》都给予了恰当的命名。

当然，作为一部1500多万字的巨型目录，面对纷繁复杂的敦煌遗书，不可能一次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在著录体例和文书的定名、定年等方面，在目前的条件下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比如著录体例，录文一项就值得商榷。首先从功能角度看，目录的核心是向读者提供内容的标题，如果介绍内容也应该是用编者的语言概要介绍文书的内容，

而不是全文抄录。如果是全文抄录，著作的性质就变成释录而非目录了。所以，在目录的著录体例中设置“录文”是不妥当的，混淆了目录和录文类著作的功能。从实际操作看，任何敦煌遗书的目录都不可能抄录全部敦煌遗书的内容，只能是有选择地抄录。因为工作量太大了，实际情况也太复杂了。这样的工作既非编目者所应承担，亦非编目者所能承担。既然是有选择的抄录，如何取舍，也是难题，势必造成体例不纯。所以我以为在著录体例中还是删掉录文一项为好。

第二个问题，个人感觉这部目录的规模过于庞大了。这样大的鸿篇巨制，虽然有著录详尽的优点。但对于敦煌学以外其他各学科的学者，他们可能更需要只包括敦煌遗书标题的简明目录。如果能有一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明目录》，其他学科的学者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全貌，并从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文献。因为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的图版已经刊布，读者也就能通过简明目录找到文书的图版。而每册的图版本来就附有条记目录，读者如果认为有需要，自可进一步查阅条记目录。所以，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希望国图目录的编纂者能尽快编纂一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明目录》。

此外，按照编者的设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还应该包括分类目录和索引两个部分，我也期待这两个部分能够尽早问世。

虽然留有一些问题和遗憾，也有尚待完成的设想。但定名准确、著录详尽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仍是一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不仅为学术界了解国图所藏敦煌遗书提供了门径，也为未来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提供了范例，因而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以方广锜为首的学术团队 30 多年持续努力的结果。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除了方广锜外，还有李际宁和黄霞。方广锜在总序中称李际宁是团队的栋梁，黄霞则是“第一等大功臣”，但他没有提到自己。据我所知，方广锜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他不仅发凡起例，制定规范，很多事情都是亲历亲为。为了编目和学术研究，他不仅亲自核查过国图藏的每件敦煌遗书，还全部核查过英藏和法藏的敦煌遗书，并核查过俄藏、日藏和其他散藏的很多敦煌遗书。他是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触摸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这个记录不仅是空前的，以后恐怕也很难有人能超越了。就个人素养而言，他既有在研究单位（中国社科院）和高校（上海师范大学）工作的经历，又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所以具有研究和编目两方面的素养。在研究方面，他是敦煌遗书特别是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翘楚，著述等身。在敦煌遗书编目方面，他创建的著录范式和编目体系，不仅是对以往敦煌遗书编目的总结，也会成为以后敦煌遗书编目的标准。其实，与他积累的海量数据相比，目前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只是冰山之一角。他的最终目标是编出包括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敦煌遗书联合目录》，我殷切期盼他能早日完成这个目标。

我和方广锜相交三十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兄弟之谊。他

长我数岁，我一直视其为兄长和楷模。自1978年以来，他献身敦煌学和佛学研究40多年，期间失去很多，牺牲巨大，但他无怨无悔，既不为世俗之功名利禄所左右，亦不为功利性甚强之学术评价体系所绑架，一心一意，醉心学术。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敦煌学的脊梁！

最近40多年来，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我们现在倡导的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大力推动各国学者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而今，中国的敦煌学早已与国际敦煌学融为一体，每年都有很多中国的敦煌学家到各国参加学术活动，我们也邀请各国的敦煌学家来中国访问和交流。中国的敦煌学家每年都要在国外和国内组织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和东洋文库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全世界各国的敦煌学家有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我们和国外的敦煌学家是在同一对话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而不是像某些人文学科那样，实际未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研究者实际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中各自进行自说自话的研究。这样一种状况当然对双方的学术发展都是不利的。我国的敦煌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敦煌学家在最近数十年来创造了一大批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原创性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出现，就是因为我国敦煌学界有一批像方广锬这样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学者。